

開遠市文史資料選輯

第五輯

开远市文史资料选辑

第五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云南省开远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

开远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主 任 马崇孝(兼)

副主任 汪翰明
卢占清(兼)

委 员 李振声 李振兴 吴凤楼
陈 昆 陈光伟 高培林
赛双恩

责任编辑 汪翰明

目 录

军旅生涯半世纪

毕生精力献人民

- 参加革命的回忆 王锡龄(1)
- 忆毛仁学校长二三事 尹自文(17)
- 翱翔长空三十载

- 我当飞行员的回忆 王仲恩(21)
- 回忆高级农艺师杨家鹏先生 高松友(46)
- 先父杨以信一生从教硕果累 杨镇洪 杨望洪(52)
- 教坛一生耕耘

献力桑梓育人

- 回忆母亲台光秀 黄时陶(58)
- 先父孙秉权担任中华
- 民国立法委员之前事略 孙信尧(64)
- 蒋子孝任开远县长轶事 余 楫(66)

七十五载开一中

广育桃李遍天下

- 开远一中史略 周传敏(71)
- 开一中体育人才的培养及输送 周传敏(84)
- 与周泽南创建阿迷县立
- 中学有关的“流芳百世”碑 曹定安收集(88)

开远第二中学沿革	金保华整理(90)
四十年代学校生活片断	普忠科(99)
十九世纪以来开远医疗卫生概略	赵翠珍(102)

杨状元和王进士及其梅花诗	李振声(117)
梅花唱和百首	〔明〕杨升庵 王钝庵(122)

开远剪纸异彩纷呈	黄泰柏(159)
被《雍正·阿迷州志》	

漏载的一任阿迷州官	曹定安(168)
阿迷县城汉族婚礼旧俗	余 辉(171)
旧社会举办的两次集团结婚	余江 余辉(177)
建国初期的开远人民文化馆	李振声(178)

民国时期开远的党派组织	李正才供稿(184)
民国时期开远司法概略	黄俊知(189)
民国时期开远警察机构	李光叙(195)
建国后的开远工商联	罗家发(197)

明代末年的“普名声之乱”	曹定安收集整理(208)
波及全省战乱的沙定洲事件	汪翰明收集整理(213)

血债的记忆

——日机两次轰炸开远见闻	马国卿(220)
开远的反动会道门	李正才供稿(223)

民主革命时期党在东山地区民族工作

情况的回忆……………林 晓(225)

山雨欲来风满楼

——开远解放前夕政治斗争片断……………尹自文(229)

黎明前的一次篝火晚会……………普忠科(234)

万云峰落网记……………杨朝品(236)

赵文富智斗匪首……………何振昌 郭耀华(242)

珍稀植物——木棉在开远种植

始末……………潘致凯收集 汪翰明整理(249)

木棉记(遗稿)……………付 植(255)

云南木棉事业与木棉公司……………张天放(261)

创办小龙潭先农棉场及

部份职工被捕的回忆……………高松友(265)

开远香蕉种植业的兴起……………戴家德(271)

香蕉种植业的衰落及其复兴的希望……………潘致凯(274)

开远的棉花种植考……………戴家德(277)

四十年代的云南省

烟草改进所开远分所……………李培源 傅貽让(280)

昆明大雁烟草股份

有限公司迤南收购经销部……………李培源(284)

开远双季稻推广的几个阶段……………戴家德(286)

开远寺庙建设史考……………高培林 张天凤(290)

开远在昆明的会馆见闻……………余辑 余江(307)

高原窄轨的“活化石”

——开远窄轨铁路历史陈列馆巡礼…………… 叶炳泉(310)

三四十年代开远金融业概况…………… 李培源(318)

法帝国主义利用滇越铁路

掠夺中国数据拾零…………… 叶炳泉(322)

“世界最长的独拱石桥”——长虹大桥

的修建…………… 马如恩(324)

建桥施工中的事故…………… 陈 琨(327)

云南省第一个日榨千吨以上

甘蔗的糖厂——开远糖厂的筹建…………… 文占月(328)

三十年来开远糖厂的发展…………… 蔡文斌(337)

云贵高原的第一座

化肥厂——驻昆解放军化肥厂…………… 娄树山(342)

军旅生涯半世纪 毕生精力献人民

——参加革命的回忆

王锡龄



我出生于阿迷(开远)县城一个贫苦家庭。由于受到了革命思想的影响,我中学毕业后,于1938年初奔赴革命圣地延安,投入到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中。其后,经历了进军东北、解放大西南、抗美援朝等战争生活;和平时期,又长期从事军队建设工作,直至八十年代。戎马一生,甘苦颇多,现作简要回顾。

王锡龄 1977 年摄于哈尔滨

少年求学

我于1917年出生在开远县城一个小手工业者的家庭。家

境贫寒,尤其在我读书期间更觉困窘。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三省,东北变成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地,人民过着奴隶牛马生活,而国共两党却在打内战。统治中国的国民党蒋介石,不去打日本,收复失地,而是打共产党,打中国人。在我的幼小心灵里,除了仇恨日本帝国主义外,对国民党蒋介石也产生了怨恨,怨恨国民党蒋介石卖国投降。我的这种思想情绪,后来发展成为接受马克思主义,反对国民党蒋介石、拥护共产党、参加革命的内在因素。

我念完六年小学,考入开远县立中学,读了一年,全班改为简易师范。

在读简师期间,学校聘来一位国文老师,姓名施介庵。他是共产党地下党员,公开职业是教书,进行秘密革命活动。1936年下半年,我在他的启发教育下,走上革命道路。当时,我是学生自治会领导人之一,在工作和学习上,经常去请教他,他总是热情耐心地指导帮助我。时间长了,我们互相有了了解,谈的问题逐渐多起来,除谈工作和学习外,还给我单独谈些俄国十月革命的情况。他说,这个国家已经消灭阶级剥削制度,而且积极支持各国革命,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等等。进而又讲到中国共产党的情况,说中国共产党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朱毛红军已经长征到陕北,建立抗日根据地,延安已成为中国革命中心。他讲的这些情况和道理,对我启发教育很大,使我对苏联和中国共产党,有了初步印象,有了好的感觉。同时,读了他给我看的《共产党宣言》、马列主义小册子及一些进步书刊后,开始知道一点马克思主义,并产生了要跟共产党闹革命的思想。

我的这点革命思想,在他的不断帮助下,迅速发展起来,

看问题比较准确了，心胸豁然开朗了，心情特别舒畅。我本是一个文弱书生，家庭贫穷，当时只知用功读书，想着等简师毕业，有了工作，挣几个钱养活父母，了此一生，没有什么雄心壮志。自从接受马克思主义，有了革命思想，内心深处展开了思想斗争，认为自己自暴自弃，胆小怕事，心里愧疚不安。经过反复思考，我最后下定决心改变自己的软弱性格，奋发图强，做一个有作为的青年，投入到革命斗争中去，把自己的一切，连同自己的生命，献给国家民族，献给共产主义事业。这时，我对施老师更加崇敬和信任，他说什么信什么，叫干什么就干什么。“西安事变”轰动全国，学生思想混乱，我在他的指示下，在学生中秘密宣传国共合作抗日，反对何应钦扩大内战阴谋，又跟他上山考察民情地形，准备上山搞土地革命，打游击战争，建立革命根据地。“七七事变”，抗日战争暴发，国共合作抗日，学校在施老师的倡议下，改学生自治会为抗日救亡后援会，积极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开远中学的抗日救亡活动在城乡搞得轰轰烈烈。1937年底简师毕业，我和同班同学陈开明就随同施老师奔赴革命圣地延安。

奔赴延安

1938年初，我和陈开明至昆明，见到施老师，由他介绍认识同往延安的刘林元同志，我们四人经云南党组织介绍去延安。为了途中方便，不遭意外麻烦，四人都到教育厅报考湖南长沙中央陆军总校，录取后，带着他们发给的通行证旅行。我们由昆明出发，乘汽车到重庆。因路费微少，继续乘车有困难，就改徒步行走。徒步行走是很疲劳和痛苦的，但大家都能吃苦耐劳，坚持行走，奋勇前进。徒步行走20多天，经成都、西安，

跋涉数千里，二月下旬，到达目的地延安。

到延安，施介庵老师改为名施介。我们在招待所住了几天，然后由组织部介绍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四期第五大队第四队学习。四月，施介介绍我和陈开明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第四队学习时，听了毛主席两次报告，以及其他中央首长几次报告。大队长何长工曾多次作报告。除听报告外，还搞一些军事训练，两个多月就结业了。结业后，施介分到抗大直属队学习，刘林元调到职工学校工作，我和陈开明分在抗大军事大队，继续学习军事。他分在第一队，队长洪学智；我分在第四队，队长陈华堂。洪学智、陈华堂都是长征中的师团干部，对训练非常严格，亲自讲课，带头做示范动作。在班排连战术演习中，要求一丝不苟。我每次演习都累得疲劳不堪，上气不接下气，但能咬牙坚持下来。那时伙食又不好，每天都是吃小米饭，壳子又多，很难消化，四五个人共吃一小铁盒菜，只能吃个半饱。经过半年的训练，我瘦得不象样子。

我和陈开明在抗大学习了十个月，1938年底，一起分到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警备一团当文化教员。他分在一营二连，连队驻守在佳县黄河边上，我分在三营九连，连队驻守在吴堡县黄河边上冯家岔一个村子里。黄河那边是山西积口镇。日寇常来扫荡，并向我连阵地实施炮轰。我连全体指战员，为保卫边区，保卫党中央，日夜严守阵地。

九连是陕北红军改编的一个连队，全连除连长指导员是长征过来的以外，其余全是陕北人。除连长指导员和文书念过两三年的书，其余的都是些不识字的农民。连长指导员是宁都起义，经过长征过来的，他们最能吃苦耐劳，作风朴实，待人诚恳，对我很关心。我把他们当成革命前辈，尊重他们，热诚地帮

助他们学习文化。我们相处得很好，团结无间。

我到连队后，立即开展文化教育。进行文化教育困难很多，没有教材教具，没有笔墨纸张。我和大家想出办法，用石板作黑板，白土作粉笔，战士用木棍在地上写划，有的用沙盘写练，有的用桦树皮写练。没有教材，我采用实物教学法，每天教5至10个字。经过半年多的教学，个个认识千把字左右，会简单的加减乘除。我看到战士的进步，心里格外高兴，决心要把自己的文化知识全部都教给他们；同时进一步虚心向他们学习。我跟战士一起军事操练、生产耕地、学打草鞋，帮干部每夜查哨查铺，帮首长写总结报告。经过几个月的连队锻炼，学会了红军的优良传统作风和革命精神，政治上得到很大提高。1939年，我调离连队到马列学院学习，与连队干部战士依依不舍，离开连队就象离开自己的家。

马列学院是延安的最高学府，是学习马列主义，培养马列主义理论人才的学校，环境条件也好。学生全是党员，大部分是年青知识分子，也有不少县团干部，做地下工作的老干部，还有少许作家、诗人、演员、教员等专门人才，素质很好。学员编成若干党支部，每个为一个学习单位。支部由学员领导，没有专职干部，自己管理自己，自学为主，教员都是有名气的人物。如院长张闻天经常作专题报告，付院长王学文讲政治经济学，陈云讲党的建设，艾思奇讲哲学，范文澜讲中国通史，吴黎平讲马列主义联共党史，吴玉璋讲近代史。中央首长也经常来作专题报告，上大课，大家围着听讲。课后，指定阅读许多参考书，然后进行讨论。

学院对学员生活很关心，一个党小组住一孔窑洞，有桌凳；每人每月发一张油光纸，半块肥皂；每周吃一次大米饭，一

个肉菜；冬天有火盆取暖。每天学习八小时，其他时间自由活动。有如此好的学习条件及生活条件，我感到十分幸福！

在马列学院学习近两年，听了很多课，读了很多书，增长了不少知识，革命理论水平提高很大，为今后做好革命工作打下了好基础。

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世界大战扩大，日寇对解放区大扫荡，国民党加紧反共，革命根据地逐渐缩小，国际国内形势紧张。为克服困难，中央实行精兵简政，马列学院停办，我被调到中央党校继续学习。在中央党校，没上什么课，只是个人看书学习，大约有两个月后，便调回部队工作。我先在留守兵团卫生部任政治教员，后调到该兵团军政研究班任政治教员兼主任教员。工作一年后，军政研究班并于军事学院。1943年春军事学院又与抗大总校合并。合并后，学校任命我为第四大队训练处政治教育干事。

1942年开展全党性的整风。整风开始不久，毛泽东同志专门给兵团军政研究班作了整风报告。对整风的意义、内容、方法和目的，讲得十分清楚明白。大家听得极其高兴，听完报告，阅读整风文件，进行讨论，领会精神，提高认识。到抗大，继续整风学习，听文件传达，然后要求每人根据文件精神，联系实际，对思想作风、历史问题，认真交待。

审干之初，约有5%的人交待说明问题，但得不到信任，大会小会，分析批判斗争，直到承认是国民党红旗政策的受害者、是特务、是叛徒，才得到“解放”。不知领导怎么搞，疑神疑鬼，谁也不相信，号召大家坦白交待问题，形成坦白运动，甚至搞车轮战，逼供信，最后发展到80%以上的人都有问题。也不知什么原因，正搞得热闹的时候，坦白运动突然停下来。这一

段时间，领导承认审干搞了扩大化，对干部要逐个甄别平反。尽管如此，广大师生在精神上受到严重打击，情绪低落，埋怨领导主观主义。

整风审干运动之后，转入文化教育，开展生产运动，半天学习半天生产。生产除种粮种菜外，允许私人纺棉纱纺毛线，劳动收益归己。抗战期间，我的生活极其艰苦，冬天饥寒交迫，日子难熬。自从开展生产运动，除工作外，努力生产，挣得几块钱，增置点生活必需品，还自纺毛线、自织毛衣毛裤手套袜子，初步解决温饱问题。

进军东北

抗日战争胜利后，党中央针对国民党蒋介石妄图独占东北，进而囊括全国的野心，于1945年9月19日发出指示，实施我军“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调动十万大军，两万干部进军东北。抗大总校，率领机关干部、文工团、警卫连、向东北挺进。九月，我们由陕北出发，徒步行军，经过山西、河北、察哈尔、热河、辽宁、吉林，冲破敌人重重封锁，粉碎土匪骚扰，于1946年2月进入黑龙江省。抗大总校在北安成立军政大学总校，校长何长工，第三大队和第四大队分别在通化和佳木斯成立军大分校。

佳木斯军大分校，校长王泮清，政委叶明，副校长彭施鲁兼教育长。学校招收500余名学员，编成五个队。第三队由刘万长和我分别担任队长指导员。第三队学员，绝大多数是青年学生，有少数中小学教员。年纪大点的学员知道东北三省原属中国，“九·一八”事变，被日寇占领，成立满州国，对国共两党的情况，也知道一点；其他的青年学生对上述情况则不知道，

他们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生活十四年，对当代中国情况很陌生，对中国历史知之甚少，对国共两党的历史、两党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更是不了解。学校根据学生实际情况，课程设置主要是马列主义基础知识、中国简史、中共党史、新民主主义论。学生对这些课程学习感到新鲜，如饥似渴地学习，热烈讨论。经过三个月的学习，他们提高了政治觉悟，初步树立了革命思想。

1946年6月，毛主席发出指示，在东北要把工作重点放在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让开大路占领两厢，以便认真发动群众建立巩固的根据地，逐步积蓄力量，准备将来转入反攻。军大分校，根据毛主席指示和合江省委决定，成立合江独立支队。这个支队下属两个大队，两个大队以学员队第一、第三两队为基础，加以扩大组成。第三大队大队长和教导员分别由刘万长和我担任。支队组成后，迅速开赴佳木斯东北地区开展建立根据地的各项工作。

佳木斯东北三江三角地区，有四大惯匪：谢文东、李华堂、张雨新、孙录久。他们在日本投降后，接受国民党蒋介石的收编加委，配合国民党正规军向我进攻，在我解放区后方骚扰破坏，严重威胁解放区的巩固和建设。我们支队主要是配合主力部队，在集贤、桦川清剿土匪。这个地方只有小股土匪，各村屯潜伏一些散匪。我们的办法是集中兵力清剿成股土匪；对散匪，我们分班分排到农村做宣传教育工作，深入每家每户讲政策，劝说当过土匪的入坦白自首，改邪归正，改恶从善。我们认真执行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对坦白者登记在案，不予追究。经过一个多月时间，土匪基本肃清。接着，分班深入农村作社会调查，访贫问苦，开贫雇农座谈会，了解掌握地

富情况，弄清恶霸汉奸情况。在此基础上，成立农会，发展会员，扩大农会权力，让农会领导村屯，让农民当家作主。我们在作好准备的情况下，在集贤镇召开群众大会，斗争了几个恶霸地主和汉奸，把他们的浮财分给贫雇农。群众大会后，人民情绪高涨，农会威信大提高。在群众发动起来农会有权力有威望之后，成立了各种群众组织，建立农民自卫队。并成立党组织，吸收表现好的贫雇农入党，最后成立区乡政府。区乡政府领导土地改革，领导生产建设，并动员青年参军参战。经过三四个月的努力工作，这块根据地建立起来了。

改造起义部队

蒋介石扬言：要在三个月内，消灭东北共军。他调动数十万军队到东北，还从云南经越南海运两个军（滇军六十军、九十三军）到东北参战。蒋军气焰十分嚣张，向我军疯狂进攻，并占领许多大中城市。

1946年夏，滇军六十军184师（师长潘朔端），在辽宁海城被我军包围，举行起义。该部起义后，我军迅速调派一批干部去工作，把这个师调往安东休整。国民党向安东进攻时，这个师向黑龙江转移。乘车转移途中，在吉林石人车站，一个副师长带领一部分人叛逃，叛逃者后被全歼。其余两千多人，于年底到达黑龙江兴隆镇，部队继续整顿。把思想极其顽固的军官及老弱残疾的士兵，清理遣送回乡。表现较好的军官一部分留职工作，一部分送军大学习，一部分组编成第、第二两个干部训练队，集中教育。

这个师，经过初步整顿，改编成民主同盟第一军，领导人潘朔端、徐文烈。1947年春，民主联军总司令部任命我为该军

第二干部训练队指导员。民主同盟军第一军官兵，通过一年多的教育后，提高了政治思想觉悟。此部队补充了大批翻身农民和一部分青年学生。在这个基础上，组编成第三、第六、第九三个支队，参加东北解放战争。这时，我在第九支队第一大队任教导员，参加攻打吉林、长春之敌。

1948年秋末，滇军六十军，被围困在长春，饿死不少人。辽沈战役，逼得它不得不起义。起义后，改编成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军。这时，我又由吉林军区调到五十军，在148师442团任副政委，继续进行改造起义部队的工作。

滇军六十军，是一支封建军阀部队，长期受到反苏反人民的教育，政治反动，思想顽固，大多数人对起义不满。起义后，有2000多人想逃跑，有500多人企图谋害我军派去工作的干部，但是也有一些人觉得吃的饱穿得暖，解放军官兵平等，愿意跟随共产党干革命。

滇军六十军里，党派和封建团体十分复杂，有国民党、三青团、蓝衣社，有一贯道、家里教、佛教会、哥老会、青红帮、道德会等20多种封建组织，帮帮伙伙的小团体多如牛毛。他们结成各种势力，争权夺利，矛盾斗争复杂。官兵关系也紧张，军官对士兵压迫、枪杀、活埋、烤打、吊死，刑罚有数十种。军官施以这些刑罚统治士兵，防止士兵逃跑叛乱。军民关系更是恶劣，军为刀俎，民为鱼肉，老百姓对他们既害怕又仇恨。

要把这样的旧军队，改变成革命的人民军队，只有实行脱胎换骨的改造。我们根据中央对起义部队的方针政策，先进行组织整顿，然后进行阶级教育，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使之树立革命思想。对军官过去的错误和罪行，能够检讨改正，就既往不咎；对士兵主要是进行两个政党、两个政府、两种军队的